

西晋墓揭示太原往事

钩 希

近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系统公布了六座西晋墓葬的考古成果,这批墓葬主要发现于城晋驿、国科大校区及沙沟北街等三处建设区域。从规模宏大的多室砖室墓到结构简单的土洞墓,从象征权位的金珽印信到寄托祝愿的铭文铜镜,这些沉睡于地下近1700年的遗迹,为我们揭开了西晋时期并州(今太原地区)社会风貌与丧葬礼制的一角。

等级分明的“地下家园”

此次发掘的六座墓葬,清晰地展现了西晋时期太原地区的丧葬等级差异。城晋驿M1和M2是其中的代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葬南北总长超过20米,由斜坡墓道、甬道、主室及多个侧室组成,宛如一座精心构筑的“地下宅院”。墓道两壁修成规整的台阶状向下内收,具有洛阳地区西晋高等级墓葬的典型特征。墓室内,四角均砌有突出的砖台,考古学家称之为“灯台”,其上还发现了砖雕的圆形灯盏,印证了当时为墓主点亮“长明灯”的习俗。尤为重要的是,这两座墓保存状况完好,未被盗扰,随葬品原位保存,为研究西晋丧葬风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样本。

相比之下,国科大校区M23、M25以及城晋驿M3均是单室土洞墓,结构简单,规模较小。这类墓葬的墓主身份可能为平民或中下层官吏。尽管规格不同,但这批墓葬也有一些时代共性,例如普遍在墓底铺设石灰灰用于防潮,部分棺内还发现有石灰枕。这些发现共同构建起较为完整的西晋墓葬序列。

墓主身份与时代风尚

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是了解墓主身份与时代信息的直接物证。在等级最高的城晋驿M1中,三件核心文物以其精致的工艺和明确的指向性,勾勒出一位西晋官员的生前面貌。

象征显赫身份的金珽。这件饰物出土于西侧室棺内人

骨的头顶位置,它是墓主冠帽上的重要组件。金珽以铜牌为底,通体鎏金,整体轮廓呈尖顶、圆肩、底微内凹的样式,长约7厘米,宽约6.5厘米。其表面沁染绿锈,中央可见清晰的蝉纹,原本的镶嵌物已脱落,但周身密布的细小金粟粒依然清晰可见。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珽,附蝉为文”,这种配饰是皇帝近臣与高级武官身份的象征。在太原晋墓中发现此物,直接指明了墓主人是西晋高级官僚。

确认墓主姓名的木印章。在主室大棺内头骨旁,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枚小巧的方形木印,边长2厘米、高1.2厘米,形制规整,中部设有横向对穿孔供系绳佩戴之用。印面文字刀法古拙,正面篆刻“闵博印信”四字,背面单刻“闵博”二字。在汉代至魏晋的传统中,随葬刻有其姓名的私印是士大夫阶层的常见做法。

反映时代风尚的“位至三公”铜镜。在城晋驿M1中,出土了三面形制相似的铜镜,直径约十二厘米,厚约0.4厘米。镜背中央为圆钮,宽平的边缘显得稳重。镜背纹饰层次分明:内区正中竖列排列“位至三公”隶书铭文,两侧对称布置简化夔纹;外区环绕两周弦纹与一周斜线纹。这种镜

型是洛阳地区魏晋墓的典型器物,铭文并非实指墓主官阶,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吉语,寄托了家族对仕途致政的向往。

区域历史的学术价值

这批墓葬的发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它极大地填补了太原乃至山西地区西晋考古的空白。此前该时期的确切墓葬发现极少,此次成果为建立区域文化序列提供了关键材料。另一方面,它们是观察“晋制”与地方特色融合的窗口。墓葬在形制上遵循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官方制度,但在随葬品选择上(如罕见陶俑)又展现出鲜明的并州地方特色,反映了统一制度下的文化多样性。

太原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重大历史背景提供了相对微观的视角。墓地所在的阳城县是西晋时期刘琨数十年守卫晋阳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也是他率众奔冀之前“召集亡散”的“徙居”之地,推测城晋驿M1的墓主人可能与刘琨有一定关系。

本文图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金珽

“闵博印信”木印章

“位至三公”铜镜

爱国卫生运动海报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一九五五年讲究饮食卫生宣传海报(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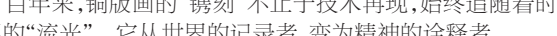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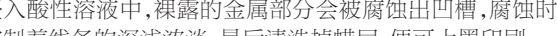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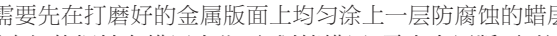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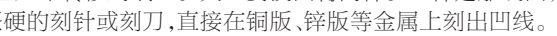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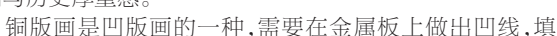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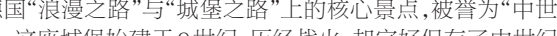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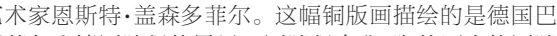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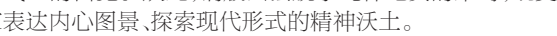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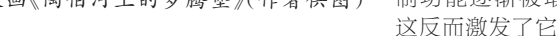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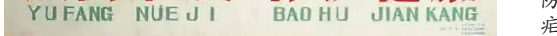
2026年是爱国卫生运动74周年,今年4月是第38个爱国卫生月。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疾病预防、蚊虫治理、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食品加工技术和卫生情况都比较落后,食品微生物污染问题较为严重,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流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工作,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将其列为卫生防疫的重点任务,并从行政管理、法治建设、机构设置、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系统推进相关工作。

1952年,乙脑被纳入我国法定传染病。为有效控制乙脑等传染病的传播,人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综合举措:不仅颁布相关法规,建立疫情报告制度与防疫机构,还广泛开展灭蚊、灭蚊、改厕、环境清理等具体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乙脑疫苗的推广接种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幅降低了重点人群的发病率。

20世纪60年代,全国积极响应爱国卫生运动号召,一方面大力清除蚊虫孳生地、改善居家防蚊设施,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引导群众主动改变不卫生行为,减少露宿、及时就诊。同时,通过推行全人群服药和传染源控制等防治策略,有效遏制了疟疾的大规模暴发流行,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版编辑整理



以酸为墨 以刀为笔

岳 娟

太原市博物馆展出的“铸续流光——19至20世纪欧洲铜版画特展”,带我们走进了铜版画这门古老又迷人的艺术世界。

铜版画是一门以金属为版、以酸为墨、以刀为笔的艺术。自文艺复兴以来,它以其独特的线条与肌理,承载着欧洲文明的视觉记忆。进入19至20世纪,这项古老技艺经历了一次关键的艺术转折。随着摄影术的发明,铜版画原本承担的图像复制功能逐渐被取代,这反而激发了它在艺术形式上的自觉。从此,铜版画摆脱了纯粹纪实的束缚,蜕变为艺术家表达内心图景、探索现代形式的精神沃土。

展览中有一件1950年的作品《陶伯河上的罗腾堡》,作者是德国艺术家恩斯特·盖森多费尔。这幅铜版画描绘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著名小镇罗腾堡的风景。罗腾堡全称“陶伯河上的罗腾堡”,是德国“浪漫之路”与“城堡之路”上的核心景点,被誉为“中世纪明珠”。这座城堡始建于9世纪,历经战火,却完好保存了中世纪的风貌。城墙与城门,是德国保存中古世纪风貌最完整的城堡之一。盖森多费尔用铜版画的细腻线条,捕捉到了这座童话般小镇的浪漫情调与历史厚重感。

铜版画是凹版画的一种,需要在金属板上做出凹线,填入油墨,经压印转移到纸上。其主要技法有两种。一种是雕线法,需要用坚硬的刻针或刻刀,直接在铜版、锌版等金属上刻出凹线。这种方法产生的线条清晰、有力,富有金属的锐利质感。另一种是蚀刻法,需要先在打磨好的金属版面上均匀涂上一层防腐的蜡层,然后用尖细的钢针在蜡层上作画,划掉蜡层,露出金属版面,接着将版浸入酸性溶液中,裸露的金属部分会被腐蚀出凹槽,腐蚀时间长短控制着线条的深浅浓淡,最后清洗掉蜡层,便可上墨印刷。

百年来,铜版画的“雕刻”不止于技术再现,始终伴随着时代与心灵的“流光”。它从世界的记录者,变为精神的诠释者。



铜版画《陶伯河上的罗腾堡》(作者供图)

傩戏千面 神韵悠远

郭 悦



宋 佚名《大傩图》轴

太原市博物馆展出的“傩魂神韵——中国傩戏·傩面具艺术展”,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老文化的大门。傩,是一种源自史前的文化现象。它以驱鬼逐疫、祈福禳灾为核心,历经数千年演变,成为融祭祀、戏剧、舞蹈于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傩戏与傩面具,是傩文化最突出的载体。它们蕴涵了中国数千年的民俗与审美意识。本次展览通过众多珍贵展品,引领观众走进这一神秘而深邃的艺术世界。其中三件文物尤为引人注目。

《大傩图》轴是一幅宋代风俗画,原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作描绘了12位头戴奇形面具、身着怪诞服饰的人物。他们围成圆圈,手持鼓、铃、檀板等乐器,或执扇、婆、帚等用具,正在进行驱除厉疫的傩仪。人物造型头大身短,动作夸张,充满欢乐的仪式感。画中服饰配饰如松柏梅枝、蚌壳螭螭等,为研究宋代民间信仰与生活提供了珍贵图像。

堂戏面具“开山”造型威猛狰狞,头生双角,嘴吐獠牙,眼睛暴突,眉如烈焰,面色赤红,充分展现了其疾恶如仇、凶悍威武的性格。“开山”又称“开山莽将”或

“开山猛将”,是流行于贵州、湖南等地的傩戏中的重要角色。在戏中,他是最凶猛的镇妖神之一,手执金光钺斧,负责砍杀五方邪魔,为人们追回失落的魂魄。相传开山是崔嵬外之子,怀胎十年方出生,力大无穷。堂戏,因早期多在堂屋演出而得名,又称“踩堂戏”,主要流行于湖北巴东、神农架及重庆巫山等长江沿线地区。它起源于还愿敬神和吉庆贺喜的“跳花鼓子”,声腔主要分为“大筒子腔”和“小筒子腔”。表演程式古朴,开演前要打闹台锣鼓,跳“天官赐福”。

地戏面具“邓婵玉”是安顺地戏面具。地戏与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和军屯文化密切相关。屯守贵州的将士将故乡的傩戏与军事演习结合,创造了地戏,用以演练武事、娱乐军民。其表演粗犷刚健,只演武戏,不演文戏,歌颂忠臣良将。邓婵玉是《封神演义》中的女将,面具为女将造型,尺寸较小,弯眉凤眼,面容坚毅。地戏面具是表演的灵魂,演员戴于额前,面罩青纱,在一锣一鼓伴奏下随口而唱,应声而舞。

从史前先民的万物有灵崇拜,到商周庄严的傩祭,再到汉唐以降融入民俗的傩戏,傩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它庄严神秘,也灵动诙谐。一张张面具,不仅是戏剧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审美取向与世俗生活的生动写照。

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



堂戏面具“开山”

地戏面具“邓婵玉”

一本特殊的“书”

王 艾

罩着一层白釉,釉面呈现出细腻的波浪纹。有趣的是,每幅图都由左右两块瓷板组成。右边的瓷板用画面描绘了从种植棉花到纺织成布的全过程;左边的瓷板用文字详细记录了相关的种植技术,并配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七言绝句。

为什么陶瓷做的书能如此耐久?秘密在于它精湛的制作工艺。瓷册的封面采用了“先刻后填”的技法。工匠沿着预先写好的字迹,用刻刀精准雕刻出“御制棉花图”五个隶书大字,然后填入金粉,最终呈现出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

内页的制作更为复杂,运用了“钻拔刻瓷”工艺。工匠首先选用景德镇的高岭土,经高温素烧成细腻无瑕的瓷板。然后,画师用墨线在瓷板上勾画出图案底稿。接着,匠人使用不同规格的刻刀,在瓷板表面进行多层次切削,勾勒出细腻的轮廓,再填入墨彩。最后,覆盖一层透明的釉料,送入窑中高温烧制。釉层在高温下熔融成玻璃质地的密封层,将颜料完全封闭在釉下,从而避免了氧化和腐蚀。这正是瓷册历经数百年仍色彩如新的关键。



《墨彩钻刻御制棉花图册》(资料图片)

有一本特殊的“书”,它不怕水浸,不惧虫蛀,即使历经数百年,依然字迹清晰,触手如新。这就是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墨彩钻刻御制棉花图册》。它由多块长14.5厘米、宽10.5厘米的瓷板组合而成,采用传统的经折式装帧,一套两本。书的封面和封底用金笔裱衬,外面再以红木夹板保护。

首页的两块瓷板上,是清康熙帝所作的《木棉赋》。随后的32块瓷板,则是16幅生动的“棉花图”。这些瓷板表面都



龙兴寺碧落碑(作者供图)

龙兴寺碧落碑

成石

一座古塔高耸于运城市新绛县城高阜之上,格外引人注目。沿着街道向古塔走去,原来是闻名遐迩的龙兴寺。

龙兴寺始建于唐,因其供奉碧落天尊,故名碧落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改称龙兴寺。宋太祖赵匡胤曾寓居于此,把龙兴寺改名为官,后被僧人占据,恢复龙兴寺之名。龙兴寺建筑布局独特,塑像艺术性很高,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物保护价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大雄宝殿前有一尊碧落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其碑文共630字,以小篆为主体,融合甲骨文、钟鼎文等古文字体,笔画工整,字形狭长,使用30余个假借字,现存于寺内碧落碑亭。

碧落碑镌刻于唐高宗三年(670)。此碑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的四个儿子为其母房太妃祈福而立的。碑文共630个字,称颂了其母房太妃的懿德风范。书刻奇古,行笔精绝,被文字学家誉为“独树一帜”的汉字遗风,是研究汉字演变的一个珍贵实物。

碧落碑不仅文字精彩,其碑后还有动荡的唐室风云。

李元嘉的夫人房妃,是名相房玄龄的女儿,咸亨元年(670)病逝于潞州。李元嘉调任泽州刺史后,其子李譔辞去通州刺史之职,也来到泽州。唐永淳二年(683),李譔在泽州弥勒佛寺铸刻摩崖碑,为房妃祈福。不久,李元嘉又调任泽州刺史,父子二人遂于泽州碧落观内铸造道教天尊像,并在神像背后刻碑,再次为房妃祈福。

从两处刻碑的时间来看,是在武则天临朝摄政的时期。武则天连续调动李元嘉的职位,其目的是对李唐宗室加强控制。李元嘉是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弟弟,是唐高宗李治的叔父。太宗崩,高宗病,武则天主政,这时的唐室中以李元嘉最有威望。武则天逐步控制和消灭李氏诸王。李元嘉父子看似为房妃立碑祈福,实际是为了李唐王朝的皇祚而祈祷。

李元嘉父子立碑同时,还联络各地的李氏王公起兵反抗武则天。越王李贞率先发兵,由于策划不周,其他各王在仓促之间未能及时响应,结果失败。李元嘉因此被逼自尽,李譔被处死。碧落碑背后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